

《福建文学》六十年作品典藏 1951-2011

散文卷

# 紫藤萝瀑布

福建文学杂志社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HAIK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福建文学》六十年作品典藏 1951-2011

散文卷

# 紫藤萝瀑布

福建文学杂志社 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藤萝瀑布/福建文学杂志社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4

(《福建文学》六十年作品典藏)

ISBN 978-7-80719-608-2

I. ①紫… II. ①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5584 号

《福建文学》六十年作品典藏

### 紫藤萝瀑布

---

福建文学杂志社 编

责任编辑 谢 曦

助理编辑 邱戊琴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网 址 [www.hx-read.com](http://www.hx-read.com)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3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608-2

定 价 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福建文学》六十年作品典藏

## 编委会

主 编 黄文山

副主编 郭志杰

编 委 黄文山 郭志杰 练建安 陈 健 贾秀莉

石华鹏 杨静南 林 芝 林东涵

中篇小说卷选稿 黄文山 杨静南

短篇小说卷选稿 石华鹏 林东涵

散文卷选稿 贾秀莉 林 芝

诗歌卷选稿 郭志杰

# 目 录

## contents

- “干扰”/巴 金/1
- 我的故乡/冰 心/4
- 住院偶笔/郭 风/10
- 紫藤萝瀑布/宗 璞/14
- 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16
- 香溪/菡 子/19
- 拐弯的手势/刘心武/22
- 秋山红叶青龙桥/袁 鹰/27
- 土屋里的水酒/何 为/31
- 寻觅/王充闾/33
- 神仙和恋旧/何满子/38
- 美女危险论/孙绍振/41
- 严文井二三事/阎 纲/46
- 为儿子推荐几本书/舒 婷/49
- 女孩子的花/唐 敏/55
- 跪着挣断脐带/韩静霆/59
- 站在福州的阳台上眺望/南 帆/63
- 喇嘛不饮酒/王宗仁/66
- 那年在厦门听雨/刘兆林/70
- 红瓦鸽群/鲍尔吉·原野/76
- 什刹海滋味/韩小蕙/79
- 房间里的海/张爱华/89
- 密林中的海子/黄文山/94
- 一些感觉你有没有/丹 娅/97

- 参星与商星 / 陈慧瑛 / 104  
一技傍身 / 潘向黎 / 108  
武陵人远桃源近 / 楚 楚 / 110  
登上乾陵 / 施晓宇 / 114  
南音这一条溪 / 陈志泽 / 118  
长柄锄头短柄镰 / 余世磊 / 125  
面对九十六级楼梯 / 章 武 / 128  
心灵的叩问 / 许怀中 / 132  
海月夜 / 何少川 / 134  
纹路 / 朱以撒 / 136  
天堂回韵 / 王剑冰 / 141  
圆浑浑,活泼泼 / 康启昌 / 147  
草原雨 / 陈元麟 / 153  
桃色珊瑚 / 季 仲 / 156  
虎岭遐思 / 张 惟 / 159  
是偶非偶 / 汪莉莉 / 161  
被遗忘的洪承畴 / 戴冠青 / 166  
熏沐在宋元大港岸上 / 蔡飞跃 / 170  
翠绿无边 / 陈 震 / 174  
虎头山小品 / 林万春 / 178  
群山中的日光岩 / 哈 雷 / 182  
止止有庵 / 张建光 / 187  
树犹如此 / 唐 颐 / 189  
鱼 / 苏诗布 / 192  
  
后记 / 黄文山 / 196

# “干 扰”

巴 金

《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已经编成，共收“随想”三十篇。我本来打算每年编印一集，字数不过八九万，似乎并不费力。可是1981年我只发表了十二则“随想”，到今年6月才完成第三十篇，放下笔，已经筋疲力尽了。可以说今年发表的那些“随想”都是在病中写成的，都是我一笔一画地慢慢写出来的。半年来我写字越来越困难，有人劝我索性搁笔休息，我又怕久不拿笔就再也不会写字，所以坚持着每天写两三百字，虽然十分吃力，但要是能把心里的火吐出来，哪怕只是一些火星，我也会感到一阵轻松，这就是所谓“一吐为快”吧。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简单。意外的“干扰”来了。在我的右背上忽然发现了囊肿，而且因感染发炎化脓，拖了一个月，终于动了小手术，把脓挤干净，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边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还铺着软垫，在它上面要翻个身不碰到伤口，实在不容易（对老人来说）。我刚刚翻过身躺下，以为照这姿势可以安静地睡一阵子，没有想到一分钟才过去，我就觉得仿佛躺在针毡上面，又得朝原来方向翻回去。我这样翻来翻去，关灯开灯，疲劳不堪。有时我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里越来越烦躁，一直无法安静。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静，但是没有办法。工作、计划、人民、国家……都不能帮助我镇压心的烦躁和思想混乱。我这时才明白自己实在缺乏修养，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标——言行一致现在也很难达到。在这短短的三四个钟头里什么理想、什么志愿全消失了。我只有烦躁，只有恐惧，我忽然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狂。我在挣扎，我不甘心跳进深渊去。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很痛苦，也很疲劳，但终于闭上眼睛昏睡了。

一连三夜都是这样，睡前服了两片“安定”也不起作用。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午睡时躺下几分钟就忍受不了，我只好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消磨时间。我不愿意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妹妹和子女们，害怕他们替我担心。我一个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回忆那些不眠的长夜，我知道它们来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

神折磨，是“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后遗症。事情并没有结束。我还在忍受痛苦的磨炼，还在进行生死的斗争。经过了痛苦难熬的三个夜晚，我快要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是我的心逐渐恢复了平静，也许是我的脑子因疲劳而变成迟钝，我又能闭上双眼沉睡了，即使有时还做噩梦，但是我不再心烦了。“危机”似乎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又出现了无端的烦躁，不过只有两夜，而且每夜不到两小时。以后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现在伤口也已经愈合。医生说等到秋凉再去医院动小手术把囊肿取出，就不会再有麻烦。我也就忘记了那些难熬的不眠之夜。人原来就是这样健忘的，想起来实在可怕。

在编辑《真话集》的时候，我重读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写的三十则“随想”，忘记了的事情又给想起来了，因为从《人言可畏》起最后四篇短文都是在“危机”中间和“危机”前后写成的。它们使我记起当时的挣扎。特别是《人言可畏》，字数少，却在我的脑子里存放了好几个月，“危机”到来，自己在作拼死的斗争时，首先想起这笔心灵上的欠债。开始写它，我好像在写最后一篇文章，不仅偿还我对几位作家的欠债，我也在偿还我对后代读者的欠债。讲出了真话，发狂的“危机”也过去了，因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卸下了精神上的负担。

我唠叨地讲自己的“危机”，只是说明作家的“思想复杂”。作家的脑子并不像机器那样一开就动一关就停，一切听你指挥。

细心的读者也可以看出《三访巴黎》和《知识分子》两篇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两篇“随想”都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动笔，当时我写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因别的事情“干扰”把它们搁在一边，差一点连原稿也不知去向，幸而后来我想起了它们，过了几个月找出原稿续写下去，总算按计划写成了。

那么“干扰”从哪里来？

可以说“干扰”来自四面八方。这些年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像是旧社会里的一个吹鼓手，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看书，我得为各种人的各种计划服务，我得会见各种人，回答各种问题。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却不得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我说不要当“社会名流”，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作家，可是别人总不肯放过我：逼我题字，虽然我不擅长书法；要我发表意见，即使我对某事毫无研究，一窍不通。经过了十年的“外调”，今天还有人出题目找我写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过去，还有人想从我身上抢救材料。在探索、追求、写作了五十几年之后，我仿佛还是一个不能自负文责的小学生。

我的工作室在二楼，有时我刚刚在书桌前坐下，摊开稿纸，就听见门铃在响，接着给人叫了下去。几次受到“干扰”，未完的手稿也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



了,有的就石沉大海,只有这两篇不曾消失在遗忘里,终于给找出来加上新的内容同读者见面了。在我的长时期的写作生活中被“干扰”扼杀的作品太多了。所以听见门铃声,我常常胆战心惊,仿佛看见过去被浪费掉的时间在眼前飞奔而去。我只能责备自己。一个作家有权利为他自己的写作计划奋斗,因此也有权同“干扰”作斗争。

最近人们忽然对已故法国作家存在主义的大师萨特感兴趣,我听见有人私下谈论他。1955年10月他同德·波伏瓦女士访问上海,我在家里接待过他们。但是我当时很谨慎、很拘束,讲话吞吞吐吐,记得只谈了些像用第一人称写小说一类的问题,还是他提出来的。1979年我访问法国,他双目失明在家养病,曾托法中友协设法联系,打算登门拜访,却没有得到机会。1981年我再去巴黎,他已经逝世,听说有几万人参加他的葬礼。关于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部多幕剧,也谈不出什么,对存在主义我毫无所知。但是他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不赞成“把作家分为等级”。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分为等级的东西,而你在这种文学中属于这样的级别。我否认这样做的可能性。”(见《萨特和波伏瓦的最后一次谈话》)他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在重视等级的社会里,人们喜欢到处划分级别。有级别就有“干扰”。级别越多,“干扰”也越多。于是“干扰”也成了一种荣誉,人们甚至为争取更多的“干扰”而奋斗。这难道是正常的现象?

……刚才下过一阵雨,但已经止住多时了。我推开窗,凉风吹进房来。窗外夜像长流的水一样逝去,却没有一点声音。连对面新建未成的高楼也带着它的各种噪音隐去了。我坐在写字桌前,没有“干扰”,我仿佛在读者们的中间,又仿佛在后代人的面前,顺着自己的思路落笔,写出自己的真实感情。我写得极慢,但是我不停地写下去。我感到了幸福。我说过,作家的荣誉在于读者们高兴阅读他的作品。那么作家的幸福就是:在没有“干扰”的安静环境里奋笔写作,把心掏出来交给读者。在写出了心里话之后,我一定会得到安适的睡眠。

发表于《福建文学》1982年第10期

入选《八十年代散文选》

# 我的故乡

冰 心

我生于1900年10月5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子修(銮恩)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1911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原原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漂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

父亲记账、要账。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1920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的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1911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

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

海阔天高气象  
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副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花花相对叶相当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廷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副对联是：

有子才如不羈马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副对子，因为“不羈马”夸奖了他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在大东沟决战时被击沉了。父亲溺水到了大东沟，赤足走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

×××××××  
 此身何事学牵牛  
 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海战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

筵已散，  
堂中寂寞恐难堪，  
若要重欢，  
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帮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1912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久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宅第，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方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1936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

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复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松多了！

发表于《福建文学》1979年第4—5期  
 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卷》

# 住院偶笔

郭 风

四十余年以来,或者,略为说得具体些,即从我刚过而立之年,又经过中年直到现今逼近八旬的迟暮之年,未曾住过医院。自己想来,这似乎是有点趣味的事。本人自幼体弱多病;成年以后,体质仍弱,居然都未曾患过非住院不可的重病。不过,这且按下不表。至于这次住院,现在看来也非什么重病;当时,医生非要我住院原因是,心跳过快以及咳嗽不止而已。还记得由于手中尚有一则未作毕的小文,颇想延迟两天进院,而亦因为医生“动员”的紧迫,于是,只好由儿子为我收拾若干日常生活用品并办理住院手续;自己在书橱里随意抽出一本法朗士的《企鹅岛》,放在衣袋里,准备在住院期间重读这么一册抒情诗一般的、具有美丽的幻想和寓意的书籍。就这样,我作为一员病号住院了。

和我安排在同一病室的老张,离休前是省里某厅的一位负责同志。他因胃病施行手术,正处于恢复阶段。为此,他除每日上午挂瓶、打针外,下午及夜晚均回家中休息(一则家离医院很近,二则胃病初愈,不得不少食多餐,这在家中较为方便)。这样,这间病室实际上便成为我的“单人病室”。这不免使我感到些许的寂寞。不过,这种寂寞,对我而言,显得有些许的陌生。这种寂寞的感觉往往在于深夜醒来时:只见薄明的灯影中,我的病床对面为另一空床,自己的床头柜上放的全是药瓶等。此等环境或云气氛,的确为我数十年来所未曾领略者。后来我想,这种陌生的寂寞感产生,认真说来,其实在于我对于家庭乃至个人书斋的气氛的依恋,尤其是在我的晚年,几乎没有离开家庭、离开书斋生活。说开来,这也是可笑的事。

有时闭起门来,独自坐在沙发上,甚至卧在病床上,想来想去。我读若干小品文,它们记述或谈论有关住在医院的事宜。似乎大半论及生死问题,从而提出其个人的生死观,字里行间出现某种哲学思考;还依稀记得某位女诗人写的小品文,记述住院分娩的“实况”以及对于生命的思考。此等作品,因为自知从某种高度去探讨诸如生命以及死亡的问题,个人少有此等天分,所以是写不出



来的。记得有位评论家说，老年人只合写点“回忆”性的小品文，此等高见，从某一侧面看来，是合乎实际的。比如，我坐在沙发上想来想去时，其间便多次想起少小时患病求医的事情。

我所称的少小时，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即距今七十余年之前也。“回忆”起来，也颇有趣。当时，在家乡莆田（主要指城关），可谓中、西医以及巫医、神医（此词是我杜撰的）等“并存”或谓同时流行于世。行医者有从英国、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以及经由某军医学院深造者，有和尚、道士，有出身中医世家者，有以圣公会的传教士的身份从英伦来吾乡布道，而又在教会所办的圣路加医院中任内科医生者（俗称华先生，洋医生），还有外省来的游医、当地的菜姑（未削发的尼姑）等等。我现在尚能“回忆”得来如此“多样化”或称“多品类”的医生行业，这可能与少小时体弱多病有关，又可能与家人对于上述种种医疗行业并无某种固定的“信赖”有关？我尚在襁褓年月，据云曾患某种急症，当时父亲尚在世，乃延请圣路加医院的华先生来诊治，只服两天的药便痊愈了，以致母亲后来常提及此事，赞叹不已。不过，我记得清楚，家中也曾延请道士、巫医乃至过境的游医为我治病。在五六岁时，曾患二次至今尚记不清是何等疾病：右下肢不能伸直，行走不便，不得下床。先母极为焦虑不安，这且按下不说。只说一天傍晚，忽有一戴道冠着道袍的道士，手摇铜铃，在我的床前喃喃念咒；又记得有一位操外省口音的女巫、游医，将盐和米用破布包成一只小球，在我的右腿的关节处，一边摩擦，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我已记不得当时右下肢两次出现的病患是如何医愈的，而对道士和女巫为我治病的某些情景似乎尚能记得真切。此外，记得平日如有小恙，我还服过供在神龛前香案上的“神菜”，以及“符灰”。上述种种，此次住院期间，居然一一“回忆”起来；对于此等事，如今有人或可视为“笑谈”，在七十余年前，在某些社会阶层中间，居民对之想必持以虔敬的态度？如此，我想视之为一种历史现象，或许才算公允的。

不知何因，在医院住院时居然思考中医和西医的问题；其实，我对此二道绝对一无所知。或因平日喜读杂书，包括若干古籍，比如对于《老子》《庄子》（即所谓《道德经》《南华经》）及儒家著作，一鳞半爪地得知一丁点儿这些圣人、哲人有关养生或曰摄生、颐养之道。我以为他们在这方面的论述，亦颇具东方哲学以及道德观念的色彩；说得略见“辉煌”一点，或可谓之从哲学高度以及道德范畴来把握养生之道。私意以为，这实在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比如，老子尝言“道法自然”，此说用于养生方面，即所谓顺应自然以却病延年。孔子则倡“仁者寿”，显然是以为人之行为无愧某种道德规范者，其心坦然豁然，必能益寿。此外，荀子尝称“老不长虑，困乃速竭”，以现代语言表达，大概是要用脑吧？按照我自己